

祖传

李传岐
李宛亮
著

针灸 常用处方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祖传针灸

常用处方

李传岐 李宛亮 著
李世珍 指导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祖传针灸常用处方/李传岐等著.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117 - 08136 - 8

I. 祖... II. 李... III. 针灸疗法 IV. R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0711 号

祖传针灸常用处方

著 者: 李传岐 李宛亮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继线 010 - 67616688)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 3 区 3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http://www.pmph.com>

E - mail: 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 - 67605754 010 - 65264830

印 刷: 北京机工印刷厂 (宏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7.75

字 数: 69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117 - 08136 - 8/R·8137

定 价: 4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 - 87613394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销售部联系退换)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集家传五世针灸临床经验,具有中医辨证论治特色的针灸处方专著。内容丰富,论治确切,临床实用,为针灸临床医生所难得的必修书。对于科研、教学乃至学科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常用处方是依据腧穴功能和配伍后的协同作用而创立的,同时结合病机和证型进行整体治疗、辨证取穴。

全书分总论、各论两大部分,共 15 篇,49 个处方。总论 6 篇,即方论、针灸与方药、腧穴功能与配伍后的协同作用、家传补泻法的演变及临床应用、处方主治范围的一般规律、医话等。各论 9 篇,即补益类、温阳类、清热类、理气血类、祛风类、祛痰类、安神类、调胃肠类、其他类等。每个处方为一单元,下设有方治渊源、腧穴组成、操作方法、功能效用、主治范围、方证简解、所治病证、临床应用、病案举例、方效相较、注意事项及其他等 12 部分。其中方证简解和临床应用为其核心,前者是从腧穴功能和病因病机两个方面揭示该方特征、组方机制、方与证的对应辨证关系等,后者是具体临床应用,针对病证证型特征加减变化灵活应用。另有附篇,内容分两部分,即误治辨析案例和医话。医话又分作者祖父医话和父亲医话两部,均为其数十年的心得体会,涉猎很广,内容十分丰富,值得一读。

本书与《常用腧穴临床发挥》、《针灸临床辨证论治》堪称三姊妹篇。由腧穴功能到处方组合到临床论治,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针灸辨证论治体系,自成一家之学。

序言

自李世珍先生的《常用腧穴临床发挥》1985年问世，到1995年的《针灸临床辨证论治》，至2006年的今天，先生嫡子嫡传李传岐的《祖传针灸常用处方》的出版，历经20余载，三部书洋洋200万言。我们看到了中国针灸学的一个学术体系的隆重诞生。

针灸学在现代科学的理论思维框架下，几乎是最难构建成型的应用学科。科学的思维，立足于物质和实证，而针灸学的核心支点却是科学思维之外的玄学概念——气，针灸学的基础结构亦是科学不能做出实证的经络学。气——经络——腧穴的这样一个系统，是一个典型的东方“象”系统。中医学应该是世界一切应用学科的最的“象”系统。针灸学作为中医巨系统中的一个最大的子系统，它既有东方玄学的突出特质，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个性特点；它既与中医学同源同流一脉相承，又建立了相对独立而严整的认识论框架和操作施治方法。结合现代认识疾病、认识生命健康的需求，结合现代学科化、系统化、理论化的学科建构特点，在针灸学中建立一套严谨的科学的学术体系，对于中医学的发展确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李氏父子出版的这三大卷书，我们权且称之为“李氏针灸学”。“李氏针灸学”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法、方、穴的一体性、完整性和系统性。

中医的理、法、方、药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理和法是中医

立论的基础，方和药是中医治疗的实现。中国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基础的、核心理论有着强烈的象征性和模糊性。如阴阳，阴阳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内核，以阳性特征的象征意义和阴性特征的象征意义涵盖了一切存在。五行的金、木、水、火、土，非指五种元素，而是以五种元素的各自属性，与世间万事万物的各自性质进行类属性划分，以模拟推衍万事万物依照各自的性质和能动所产生的关系指数以及生克制化的过程。阴阳学说是东方认识论的核心，五行关系建立了东方认识论的模型，而中医恰恰又是建立在这样的具有象征性模糊性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的。同样，中医的理、法、方、药是中医认识论的框架，这个“理”并非仅指医理、病理，亦指天理、地理、世理（社会）以及时理（五运六气），是一个与人相关的各种理浑然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大理。这个“法”不单是治则，它包含着中医学对疾病和治疗的东方性界定、衡量和通观，也包含着医家的境界、学养、德性、知识和技术。这个“方”，就不单是若干味药按照其药性、归经、功用来组方配伍的“方”，而是落实在中医的理论原则下的一个规矩、规范，体现在合适的量、恰当的度以及合理的组合上。那这个“药”就不单是我们中药堂铺里以植物药为主的中草药。“药”一方面是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丹石、动物类的物质，一方面是有治疗价值的技术和方法。

中医现在的问题出在两头：一头，理出了问题；一头，药出了问题。中医的理直接基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五行理论，进一步派生出经络、气血、三焦以及具中医特色而非解剖实指的脏腑系统。由于当代的各行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失，阴阳五行理论已经与中医形成了潜在的但又是较为严重的脱节。中医学的教育对此不甚了了，现代中医界排斥非难阴阳五行理论似乎有成为风尚的趋势。大部分中医抛却经典，断了与传统经典中医学的联系，不得不在“法”和“方”上面盘桓。

而“法”一旦与“理”脱节，原来被称之为大法的，可能久而久之也将蜕变为小术末技。尤其在西医科学理论的强势胁迫下，中医的“法”已经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中立定坐实，于是也就不得不借用西医的“理”来硬套中医。长期以来，中医的“药”过于贴实在现在流通的中草药上，而对动物的保护和对矿物的重金属含量的限制，越来越使中医等同于“草药”医了。在中医的治病越来越依赖于草药的现在，草药的种植、加工和流通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大，隐患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不能保证，中医手中的“药”的“利器”已经钝得很了。20世纪以来，西医的“药”系统却一直在扩大、延伸，除了化学制剂外，各种手术类、器械类应有尽有，而且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又不断地扩充着西医用于治疗“药”系统。原本，中医的理法方药的“药”也是一个多重组合的大系统，除了植物药、丹石和动物药，针灸、食疗、导引，乃至道家、儒家和佛家的行之有效的养生法门等等，都是古代中医的“药”系统的当然组成部分。而针灸又是除了草药之外的中医的“药”系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药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医，能开普通中药方子的中医多，能开西药的中医多；而在煎汤之外，能用丸散膏丹的中医已经不多，懂经络善用针灸的中医也越来越少。药是中医落实治疗的关键环节，而“药”的狭窄化和不可把握因素的增多，限制了中医学的健康发展，而中医的西化又在悄无声息地瓦解着中医的基础。

正是在中医的这种非正常的发展期，在针灸学的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低谷中，李氏针灸学坚毅而持之以恒地进行着中医学的思考和针灸学的理论创建。

李氏针灸学的第一卷《常用腧穴临床发挥》在继承传统针灸经典著作对腧穴功能及其应用的知识和经验的同时，根据自己的针灸实践，对腧穴的功能进行了深化研究。其中“腧穴功能鉴别”将同一经络功能相近似的腧穴和不同经络功能

相近似的腧穴的主要特点以及异同细心举出，使腧穴的分类辨析更加理性化。而在腧穴配伍部分，对每一主穴与某穴配伍的功效益治一一详陈，并依其腧穴组方所产生的功效益类对应中药传统典方的功效，为形象地认识腧穴配伍的功用，建立了一个重要而实效的参照系。由此作为基础向前发展，今天的《祖传针灸常用处方》一书的诞生是必然的。

建立有效的参照系，以旁通旁证来深化、强化主体理论的合理性和稳定性，是东方文化各部分与现代科学思维结构融通的一个重要方法。《常用腧穴临床发挥》不仅是建立在传统针灸学典籍的基础上，它的思考、它的理法方穴整体系统的奠定和推衍，更是传承和发扬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的医学思想，继承了后世中医学代表性学说的思想；它对腧穴的应用发挥不仅立足于传统经络学，更是立足于中医学的深邃宏大的思想体系之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是立足于上万个活生生的病例所直接得出的第一手详尽的病案资料基础之上的。这些病案来源广泛，包括男女老幼、城乡贫富、中国外国，各型各类、各科各证，应有尽有。这种建立在大量的临床实验实证实效的学科创建，体现了科学理论建立于实证基础上的典型特征。

以“足三里”一节为例，《常用腧穴临床发挥》中“足三里”穴论述的主治病种病症是针灸典籍中最为丰富的，这不仅是继承总结了前人对足三里功能的实践知识，更多的是李氏祖孙在腧穴的临床应用中，结合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结合自己独有的对针灸处方学的思考，所得出的足三里与其他穴的配穴组方的结构变化、动态变化、作用点、作用力和能量能效的变化的实证体验。这一点很类似于张仲景在《伤寒论》的主方柴胡汤剂型的八种演变过程中，依证变、病变、方变、药变的推演进行的思考。使腧穴的“普遍性”、“特异性”和“定位性”在腧穴的组方配伍中得到深入的体现；同时，腧穴

的调节阴阳气血平衡、有效地治疗疾病以及为针灸腧穴所特有的防病健身、强体益寿的作用，都得到了最有效的表达。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李世珍先生的《常用腧穴临床发挥》一书，是在继承他祖辈的针灸学识和对中医学的实践思考基础上，基于传统的脏腑经络学和中医学坚实的理论基础，推演并完成了针灸方穴配伍的试验和验证，建立了针灸处方学的雏形。

李氏针灸学的第二卷《针灸临床辨证论治》，是以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为框架，把经络、腧穴、脏腑、疾病以及腧穴组方纳入到辨证论治的法则中，进行针灸学的深入研究。针灸的疗效，首先是建立在腧穴功能的认识和运用上，针灸学的基础理论、治疗原则和组方原则仍然基于中医学的主体。李氏针灸学提出的“理法方穴”，其中的“理”和“法”是直接基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而它的“方”，是通过运用中医理论对病因、病理、病位、病机、病势、病程，运用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或卫气营血辨证后，结合经络和腧穴的功能主治所产生的为针灸学所特有的“方”。李氏针灸学是中医学辨证论治思想在针灸学中的体现。李氏针灸学提出的“理法方穴”与传统中医学的“理法方药”是同源、同体、同功的。

《祖传针灸常用处方》一书的成功出版，使李氏针灸学趋于完善和完整。具体到中医的“方”，是用于完成治疗的药物的组合模型，包含了理、法、药诸要素。中医通过对病、证、症的辨别建立了各种证型；又通过把药物的药性、功能主治和归经等要素组合起来与证型结合，建立了方型。病的证型化和药的方型化，使治疗有轨可循有章可依。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质和中国文化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特色也尽在其中。李氏针灸学，基于完备的中医基础理论，基于中医已经确立的各种证型，完成了针灸处方学的建立。

《祖传针灸常用处方》有着清晰的脉络。李传岐先生的祖

父李心田撰著的《针药汇通》为针灸处方学搭起了一个坚实的框架。到传岐先生父亲李世珍著的《常用腧穴临床发挥》，在《针药汇通》的基础上，充实扩大了针灸处方学的内容。根据中药汤方的方义、功效和治证，结合针灸的功用，进一步为针灸处方进行了命名。李氏针灸学自李心田始，经由李世珍的发展，最终在李传岐手中完成了全部的构建。李传岐先生撰著的《祖传针灸常用处方》深入浅出地揭示了针灸处方学形成的理论基础、发展过程，详述了针灸立方的方规法度以及针灸施治的各种操作手法，通过详细剖析中药方剂的构成、治疗作用的机制与药物的性能效用特点，建立了与针灸处方相对应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比较，以中药方剂的深入分析旁证针灸处方的成立；在论及腧穴功能与配伍的协同作用时，以腧穴的不同功能为基础，以不同的针灸手法为调节，以辨证论治的法则为准绳，深入论证了立方配伍的原则；在与中药方剂的相参互映中，完成了为针灸处方的定性、定位及定型。

“协同作用”是针灸处方学的关键。西药的机制重在干预，而中药尤其是针灸的作用重在调和。一个好的中药或针灸组方，可以激发促进生命的自律调整能力，并使这种能力一直沿着处方功能所示的调整方向持续地产生正作用。我们借《祖传针灸常用处方》中一个代表性腧穴处方“滋阴清火方”，来体味一下“协同作用”的妙用。该方是由手少阴心经的神门穴与足少阴肾经的复溜穴配伍，用于治疗肾水不足、心火亢盛、阴虚火旺、心肾不交的病证。这个病证有着复杂的证候群，西医所说的“神经衰弱”的许多症状都属于这个证候群。这个病证的关键是“心肾不交”。我们从阴阳五行学说看，心属火，火性炎上；肾属水，水性润下。如果心的火性与肾的水性不交通，心位于身体上部，炎上的火性自然会上扰脑府，于是，像七窍不利、失眠多梦、头昏脑胀、耳鸣咽干、记忆力及

注意力减退等等症状会随之出现；而肾位于身体下部，润下的水性不足又同时带来遗精早泄、腰酸腿困、肢冷浮肿等证候。“心肾不交”的征象，与《周易》的“未济”卦和“否”卦有着微妙的照应。“未济”卦是代表火的离在上位，代表水的坎在下位。火性本来炎上，再让火处于上位，水性本来趋下，再让水处于下位，于是乎火愈上，水愈下，水火不能互济。“否”卦是代表天的乾在上，代表地的坤在下。天主清气，清气上升，再让天处于上位；地主浊气，浊气下降，再让地处于下位，于是清愈升，浊愈降，形不成沟通，就成了否塞不通之象。因此，易经在应用时，让火处于下，水处于上，就是“既济”；让天处于下，让地处于上，就是“泰”卦。“既济”是成功地交通在一起，“泰”即交通泰和之意。就仅仅把水与火、天与地调整了位置，分离、断裂、逆反的态势就得到了本质的扭转。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可以为这种调整作最好的说明，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包括社会和人的身体）”的阳躬身负起阴，阴昂首而抱阳，阴阳二气振荡相谐，这种形式带来的结果就是“和”。“和”被中国文化定义为最大的美、最根本的善、最高的境界。“和”同样是中国医学的最高追求。在辨证论治过程中首重阴阳，在施治的方与药上重在调。调而和之的原则是《祖传针灸常用处方》的一大宗旨。我们回过头再来看“滋阴清火方”，神门是心经的大穴，代表火；复溜是肾经的要穴，代表水，二穴的命名妙合于阴阳。神门是精神之门户，神代表人的清正之气，清则上升，是阳性态；复溜者，复为重复、为多数、为覆盖，溜为水流、流动之意，是阴性态。复溜穴可以理解为主水的肾经中水最见流动性的关窍。针灸比用药更容易实现“调”的作用，因为针灸的选穴配伍、补泻手法的选用和调治的实现是统一在施治的动态全过程中。泻法用于神门，是把火的态势和能量往下调运；同时，补法用于复溜，是把水的

态势和性能向上提升，火调于水之下，水调于火之上，滋养生命的气化作用随之产生，就成了“既济”的卦象。反复的这样调，就调动、引导了经气在针灸方的方义和针灸师的心意主使下，逐渐地建立起一种“否”去“泰”来的有序化的生命新态势。心肾不交所派生出来的证候群在“既济”的实现过程中渐次消解。“和”通过对经气的“调”而得以实现。

“滋阴清火方”具有与中国文化印证的典型性，我们在此举出，旨在倡明《祖传针灸常用处方》的组方要义是深深植根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李氏针灸学三部著作所构建的“理、法、方、穴”的针灸学体系，可以清晰地看到，李氏针灸学的思考是中国式的思考，是纯粹中医学的思考。而《祖传针灸常用处方》所立的针灸处方的方型、方规和方义，已经成为中国针灸学基础理论框架中的一个有机构件。有了这个新的构件，中国针灸学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大用妙用将能够得以实现。

值张仲景诞辰 1855 周年之际，李传岐先生的《祖传针灸常用处方》的出版，正是对医圣张仲景的最好的纪念。述之为序，以表达一个医圣祠人对李氏针灸学的深深敬意。

张兼维

2006 年 2 月于南阳医圣祠

前言

针灸医学，肇自《内经》、《难经》，继由《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乃至近代，已基本形成了独特的辨证论治体系。其核心理论就是经络学说。经络学说一直指导着针灸组方、选穴、辨证论治，其临床治疗多以循经取穴为主（本科教材语）。针灸作为中医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经络学说为指导，运用循经取穴、俞募配穴、原络配穴等，体现了针灸的特色，亦是针灸医学发展之必然。然而这种独特的理论体系是否已经完备，是否能够满足针灸临床的需要，特别是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针灸医学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将如何发展，指导中医理论的脏象学说、气血津液等学说是否能用来指导针灸临床实践，怎样指导针灸临床实践，如何使理、法、方、穴形成辨证论治的统一，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有哪些，这是后世医家，亦是吾祖数代所执着追求探讨的。

针灸医学以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临床辨证多以循经辨证为主，治疗上多为循经取穴对症治疗，对于腧穴的认识及配伍作用仅仅是建立在经络学说、特定穴、针灸歌赋的基础上。这样就滞碍了针灸医学的发展。运用中医理论，特别是脏象学说（含气血津液等学说）来指导针灸实践，通过针灸临床实践再验证理论，再以中医理论来指导针灸辨证分型、治则处方、腧穴配伍、选穴组方，使其由辨经（病、症）论治走向辨证论治，这是针灸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针灸也提倡辨证论治，因其建立在经络学说基础上，所以其辨证主要是辨其经，循经取穴。辨证取穴所辨的证与建立在脏象学说（包括其他学说）基础上所辨的证，有本质上的不同。运用脏象学说及其他学说指导针灸临床实践，弥补腧穴功能和针灸处方的阙如和不足，推进针灸医学的发展，乃是吾祖数代所不懈努力的目标。

运用脏象学说等指导针灸临床实践首先要改变传统的针灸理念与诊治方法，及经络学说为基础的某某穴治某某病（症），某某病（症）取某某穴，俞募配穴、原络配穴等循经取穴为主导的羁绊。那么，如何运用脏象学说来指导针灸临床整体治疗辨证论治呢？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学说为中医的指导理论，理、法、方、药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全过程。运用中医的理、法指导针灸是切实可行的。然而与方、药相对应的针灸处方、腧穴运用就不能很好适应其治疗需要。有鉴于此，祖辈们从基础医学开始，由腧穴功能研究作为切入点，从临床实践中探索腧穴功能、穴若药效、配穴规律、相当汤方，至祖父辈已初见成效。

祖父李心田在前辈经验的基础上，又从《内经》、《难经》、《伤寒论》、诸家学说以及诸多歌赋中吸取精华，探其机制，初步总结出某穴用补法相当于某几味中药的功效，用泻法相当于某几味中药的功效，配艾灸相当于某几味中药的功效，配烧山火或透天凉又相当于某几味中药的功效……。某穴与某穴配伍，用补法有什么协同作用，类似某个中药汤方的功效；用泻法有什么协同作用，类似某个中药汤方的功效；用先泻后补或先少泻后多补，或此穴用泻法彼穴用补法有什么协同作用，类似某个中药汤方的功效……。撰写了《针药汇通》一书，初步形成了针灸处方学的框架。

父亲李世珍在《针药汇通》一书的基础上继续从事针灸临床研究。他以脏腑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大量的门诊、病房

及西医各科转来的复杂病证为对象，在临床无数次正副效应的验证中充实并扩大腧穴功能和腧穴配伍后的协同作用以及类似某个中药汤方的功效。现通过实例说明其探索方法。在腧穴功能配伍方面，以三阴交穴的部分功能效用为例：三阴交施用补法有健脾补血养血之效，施用泻法有活血祛瘀之功，施用先泻后补之法具有祛瘀血生新血的作用。若施用补法配补具有补气作用的合谷穴可收气血双补类似“八珍汤”之效，凡属气血双亏的证候均可选用；若施用补法与具有养心血益心气的神门穴（补）配伍可收补益心脾类似“归脾汤”之功，适用于心脾两虚之证；若施用泻法配泻具有行气散滞作用的间使穴可收行气活血祛瘀之效，凡属气滞血瘀的病证均可选用；若施用泻法与具有补气作用的合谷穴（补）配伍可收补气活血祛瘀类似“补阳还五汤”之效，凡属气虚血瘀之候均可选用。

继《常用腧穴临床发挥》、《针灸临床辨证论治》之后，吾等小字辈又继在父亲李世珍的督导下开始本书的编撰。由父亲勾勒出框架，我们从事以下工作：一是以祖辈所传下来的和由父亲所创的针灸处方为依据，结合以上两部著作和集存的数万份治疗病例，以处方为核心，分门别类，再次整理，从中理出证型、治则、处方用穴、配伍加减变化之规律，以及方治渊源等；二是从整理出来的已趋成熟的针灸处方通过临床的再实践、再验证，进一步充实其学术内涵；并辅以中医理论指导、分析，规范其组方原则、操作规程，分析其功能效用，介绍其主治范围及临床应用加减变化。历时十余春秋，这部集理、法、方、穴辨证论治为一体的针灸处方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穴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腧穴是组方的基本单位，处方是腧穴运用的高级形式，又是论治的具体体现。针灸处方是在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下，根据腧穴特性，依据病机，针对证型治则选配腧穴，施用相应补泻法、补泻量以及配备艾灸、放血、烧山火、透天凉等治疗疾病。针灸处方学作为

一门学科，既要有方规又要有法度。以法组方，方证对应，方穴固定，依证选方。其腧穴功能、配伍后的功效主治与病机、证型四者必须相一致。决非功能相似腧穴的简单堆砌，亦非依其症状随意地拼凑。处方组合要作到严谨有序。

中医汤方组成原则有“君、臣、佐、使”之妙，针灸处方亦有“君、臣、佐、使”之功。是书之处方配穴原则，原拟参汤方分君臣佐使，在具体编撰过程中发现针灸之处方有自己诸多特点，非能一概而全。中医汤方之君臣佐使大多显现在该处方中，而针灸处方之君臣佐使只能显示其总貌，不可细分，这是其一。其二，针灸处方多为君臣之穴，而佐使之穴多不在本方之中，而在本方之外，多体现在临床具体运用之中。例如具有补中益气作用类似补中益气汤功效的“益气补中方”是由针补合谷、足三里二穴组成，凡属脾胃气虚、中气不足、气虚下陷的病证均可选用。在运用中，对于内脏下垂病证可加补百会佐以升阳；对于久泻、久痢可加补天枢佐以涩肠；对于尿潴留可加补中极佐以化气行水或加泻中极佐以通利小便，视具体病情而定。另外，作为循经取穴或局部患野取穴，亦可作为某一处方在具体运用的引经报使之穴来用。立方立矩在处方中，加减变化于处方之外。故尔是书，组方严谨，证治典型，论治规范，静中有序，择其常示人以规矩，予人以纲领，又临证应用中方圆变化，动静结合，见症加减，灵活运用。读者当对其【功能效用】、【主治范围】及【临床应用】相互潜心体会之。

柯琴云：“因病立方者，粗工也；据证立方者，中工也；于证中察病情者，良工也。”读者若能解读立方之法规方度，知病之情，得医之体，有是证而用是方，有方规却不为方所局限，于证情中加减变化，存乎一心，升堂入室，乃可成为大医良工。若能在吾书基础上，创新方立新意，促进针灸处方学的发展，实乃针灸医学之幸事，亦为吾等所希冀。

“常谓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柯琴《伤寒论注》序）。本书与《常用腧穴临床发挥》（简称《常》，下同）和《针灸临床辨证论治》（简称《针》，下同）堪称三姊妹篇。《常》为基础篇，《针》为临床篇，本书介乎其间，为二书之桥梁，本当先于《针》而发行，却后发于《针》十年。家父谓之曰：“《常》一书腧穴功能可增可减，《针》一书临证可变可化，而本书之处方示人以规矩，予人以典范，方若一出，多成定论，不谓不慎之”。本书之49个处方，方方都是有理有据，有法有度，数验于临床。亦有十数个处方尚未录于本书者，非为不效，实因不甚周全，或未作进一步验证，或积累案例不足，或理论不够充实，或腧穴运用不统一、不规范、功能不确切、配伍意义含糊不清，或针药同用，故而不录。

“善师者不阵，得鱼者忘筌”（《医方集解》序）吾愿读吾书者，取是方而圆用之。

方不掩瑕，谬误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同仁批评指正。

李传岐

2005年初冬于南阳 张仲景国医学院